版面编辑：陈韶旭 csx@whb.cn

田野

邹鲁访碑三题

祝帅

以往，我们把美术史区别于一般的史学研究最大的不同，界定为研究对象（图像）以及与这种对象关联的研究方法（图像志和图像学）。图像学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阐释图像的象征含义，以与哲学文献印证。而图像志的方法则是对图像各种细节的详尽考察与记录。今天随着艺术史处理对象的范畴的扩展，用“图像”来概括艺术史显然就是不够的了。艺术史的对象不仅仅是平面的“图像”，也包括立体的“田野”。

2018年4月23日至30日，笔者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派遣，与本校历史、考古二系两位同事及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泠印社、近墨堂基金会等学术机构同侪约三十余人，参加由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北大文研院联合主办的山东石刻考察工作坊。我们一行在山东当地著名书法考古学者赖非先生的向导下，先后考察了济南石刻博物馆，长清孝堂山汉墓及洪顶山摩崖，嘉祥武梁祠，济宁博物馆和萧王庄墓群，曲阜孔庙及汉魏碑刻博物馆，邹城博物馆及葛山、岗山、铁山摩崖石刻，峄山妖精洞摩崖，泰山岱庙及经石峪刻石等历史文化遗存，收获颇丰。所观摩的石刻，有些在此前曾经有机会考察过（如孔庙和岱庙碑群），但更多的则是早已心向往之的初次访问，新奇之余，诸多今后值得深究的问题不断在心头盘旋。

仍忆十八年前在美院编辑校刊《空间》时，曾编发大学同届同学衣雪峰君《邹鲁访碑散记》一文。惜年代久远，对该文所述内容早已忘却，遍寻原刊竟不可得，而网上又不见此文收录转载。因仿其大体，成此“三题”，爰将此行主要收获概括如下。

“访碑”：一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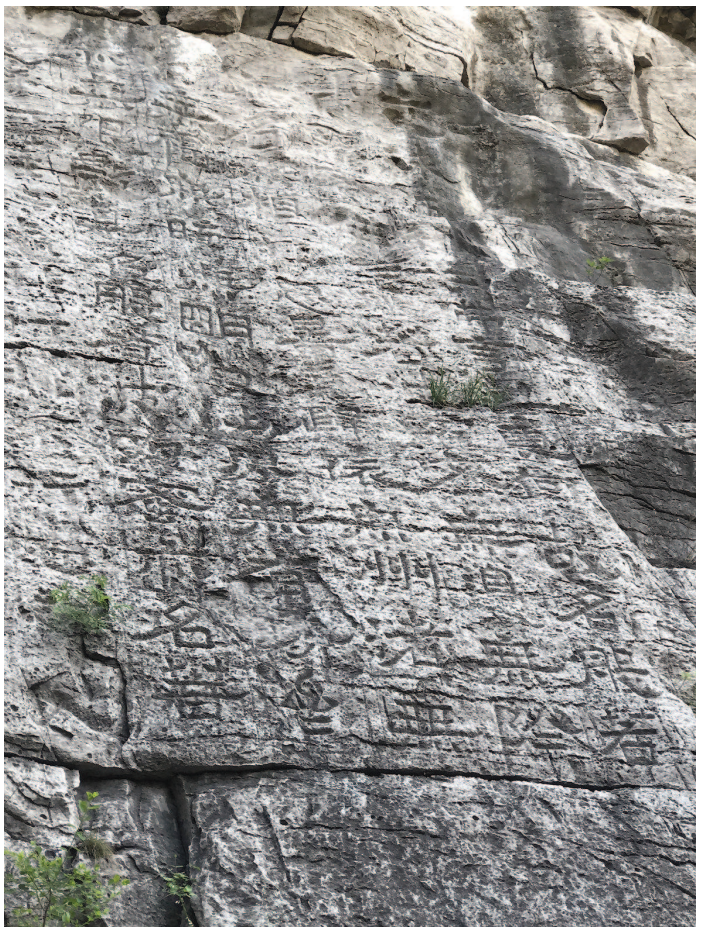
访碑之成一种风气，盛于满清。初，有黄易（小松）等人发扬斯道以兴金石之学，复有吴大澂等人勒石为记以为壮游之志。但这一切都不同于现代学术研究。西学东渐以来，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理念和方法传入我国，古老的金石之学在“罗王”及其后学的推动下获得新生，几成与重传世文献和秦系今文的“章黄”之学分庭抗礼之势。然而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研究方法远未臻于成熟。石刻史料之大量出土和研究，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事情。但即便是在“兰亭论辩”这样因新出土石刻而肇始的学术事件中，郭沫若等人关于石刻史料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基于复制品（拓片或印刷品）而不是针对王、谢家族墓志的出土地原址和地层、堆叠等进行田野式的考古学、人类学观察。

近年来，有关书法地理学、书法考古学、书法环境-类型学研究不断兴起，为我们带来了新鲜的学术思路和学术方法。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下田野，把书法史的工作领域从书斋拓展到书法作品原初的生存空间。因此，受到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研究范式的启发，这些新兴学科不同于以往的文献研究甚至是“读图”这种过去被认为是艺术史研究区别于一般的历史研究最具区分度的研究方法，而是走到田野中去——不仅仅考察碑刻史料上的文字内容和形象，更重要的是考察这些碑刻的生存环境、地理特征以及形制与装饰等早前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并且，这种研究方法越来越成为书法研究的主流和国际书法研究界的前沿趋势。

德国汉学家雷德侯，近年来启动了中国境内佛教石经刻石实地考察的研究项目，并在中国学者的帮助和向导下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们此行所考察的大量石刻，均为雷德侯曾经走过的路线。犹记邹城的岗山是此行最难攀爬的石刻所在地，我们艰难攀爬上去又匆匆而返。不料竟被赖非先生告知，雷德侯曾携其团队来此，自备午餐在山上停留了一整天。雷德侯先生的考察成果，现已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陆续出版为图文并茂的大书《中国石经》。与他此前大量的美术史研究成果相比，这些成果似乎“问题意识”并不突出，也没有提出像他之前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模块化”这样影响深远的理论。但是，如果仅仅用“资料收集”来评价一个汉学家所做的工作显然又有些低估了他的成果，因为那样的话显然并不比一个本地的研究者更具备研究的条件。那么，究竟为什么他愿意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这种资料性的工作上面呢？

我以为，这种田野考察工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这种民族志式的研究方法本身。以往，我们把美术史区别于一般的史学研究最大的不同，界定为研究对象（图像）以及与这种对象关联的研究方法（图像志和图像学）。图像学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阐释图像的象征含义，以与哲学文献印证。而图像志的方法则是对图像各种细节的详尽考察与记录。今天随着艺术史处理对象的范畴的扩展，用“图像”来概括艺术史显然就是不够的了。艺术史的对象不仅仅是平面的“图像”，也包括立体的“田野”。如果说对于田野的研究也分为“志”与“学”两部分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建立起艺术史料田野考察的民族志。这就需要研究者从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学科吸取研究方法，并结合书法专业的学科特点进行转化。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而雷德侯关于中国石经研究现阶段的贡献也正在于此。

不宁唯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证经补史”之外，石刻史料自身的研究价值也开始受到重视。随着石刻史料在书法史研究中有越来越高的本体的研究价值，在今后，对书法石刻的田野考察将不再是一门独立于图像志之外的独立的学科，它将成为一切书法史研究者都需要具备的功课，一门带有某些基础性的学科。因为随着书法研究的进展，书法的外部研究必将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做到内外互证，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书法的本体。



山东东平洪顶山摩崖石刻

山东邹城岗山摩崖

碑学：碑碣刻石何以成为书学取法对象

我们此次考察的石刻，以汉代至北朝时期居多。尽管经过了历朝的几次“禁碑”，显示出制度史对于艺术史的某种根本性的影响，但其实石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绵延未断绝。不过大概令书写和镌刻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些碑刻作品最初不是为保存书法而设，却在后世成为书法爱好者取法和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例如，我们此次看到的出于僧安道壹之手的大量佛教摩崖刻经，往往是出

（下转11版）